



【言为心声】
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中国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传统的人际关系,还有政治关系。



【言无不劲】
这个小贩本来是一个朴素的农民,来到城市之后,学会了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



【温酒论道】
改革落实的先后次序预计为社保制度改革,国企改革,能源改革,产业结构调整。



【庄周梦蝶】
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穿着总应该与他们的年龄、处境、性格、乃至阶层的设定相关。

推动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型

乔新生

湖北咸宁市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出通告,原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等36人,因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经营等罪名,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这标志着这个长期横行乡里的黑社会性质团伙即将覆灭。

许多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一案件的时候发出疑问,认为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能够长期生存下去,并且聚敛了数百亿的财产,其首要分子担任政协委员,究竟是谁充当保护伞?这个问题抓住了要害。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都有保护伞,不过,这一案件的保护伞究竟是谁,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现在许多企业感到大城市的市场饱和,继续发展潜力有限,于是,他们纷纷选择中小城市作为投资的地点。

一些企业经营者不无调侃地说,投资就应该选择城市改造农村的道路,通过参与城镇化的建设,从而扩大自己的经营地盘。然而,惨痛的历史教训提醒人们,越是在中小城市,投资的环境越糟糕。这不是因为中小城市的生产要素价格比较贵,而是因为中小城市通常都是典型的身份社会。

黑社会性质组织之所以容易生存在中小城市,是因为这些城市的人际关系非常透明。只要能与当地的主要官员搭上关系,那么,就可以呼风唤雨。一些经营者进入中小城市之后,很快发现经营环境不断恶化,用于社会治安管理的成本,远远大于企业的经营成本,为了对付黑社会性质组织,不得不与当地政府官员紧急靠拢,这样一来,必然会形成畸形的官商勾结关系。

一些经济学家分析中国经营环境

的时候,往往只看到生产要素的价格,而没有看到政治要素的价格;只看到企业劳动成本,而没有看到维护社会秩序的成本。许多企业经营者之所以疲于奔命,努力营造自己的小圈子,就是因为中国仍然处于身份社会,在绝大多数中小城市,如果处理不好与当地“土豪劣绅”的关系,那么,企业的经营将难以为继。正因为如此,许多企业经营者不得不花大钱购买保护伞,而这样的生存方式,必然会让自己陷入到政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泥潭。

企业经营者到大城市发展,通常不需要考虑企业经营的政治要素价格和维护社会秩序成本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大型城市企业经营者往往受到当地执法机关的保护,不需要为维护社会治安或者购买保护伞额外付出代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城市往往都有相对完善的法规体系,而大城市

执政者往往不会在乎“小钱”。如果没有几十亿元的身家,那么,根本不会进入大城市执政者的法眼。因此,在大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既可以受到当地执法机关的保护,不会被黑社会性质组织骚扰,同时又可以避开权钱交易,经营者很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正因为如此,尽管大城市的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消费水平越来越高,还是有越来越多的经营者选择大城市作为自己的经营场所。

当年那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在市面上横行霸道的小混混,如今不少早已洗心革面,西装革履,登堂入室,成为光鲜人物。这其中有多少坎坷,包含多少辛酸,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他们的人生悲剧,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的缩影。从小城镇走向大都市,他们付出的是许多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代价。对于许多经营者来说,黑社

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既是加害者,同时又是牺牲品。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中国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传统的人际关系,还有政治关系。因为只有政通人和,才能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才能让更多的投资者敢于在中小城市寻找发展机会。

笔者之所以借题发挥,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绝大多数中小城市仍然处于身份社会。这样的社会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譬如,资源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整个社会是单一的结构,每个居民的权利不是来自于法律,而是来自于某个社会势力。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企业的经营者最好还是选择大城市作为投资的地点。当然,解决问题的长远之计与根本之道,是推动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型。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 教授)

花生小贩玩转资本主义游戏

李劲

中午时分,照常和几位同事去南山区的和记餐厅喝茶吃饭。餐厅门口的路旁,有一个推车的小贩,车上架了一口铝锅,卖煮花生、煮玉米、煮马蹄、煮毛豆等。小贩衣衫破旧、土头土脑、乡里乡亲的样子,一边翻动着煮得热气腾腾的东西,一边突兀地吆喝:嘿!都来看啊!听口音,是西北人。

接连几天,我们都买一小包煮花生,当餐前小食,分而食之。煮花生么,太难吃是不会的,但总觉得煮得不理想。吃完饭,有好事的同事过去和小贩攀谈一番,做技术指导:你的花生有的还行有的不新鲜,你的花生不是煮熟的,是泡熟的你得把火烧大点,你的花生有的不熟,有的煮过头儿了,都面糊

了,你还煮呢!小贩点头称是,连声说好。第二天、第三天再买,依然如故。有人嘲笑小贩:忒傻,真教不会。有人提醒:谁傻呀!煮过头,沉呀,压秤。大家脑筋急转弯,一齐把注意力聚焦到小贩和煮花生上,七嘴八舌一番,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小贩形象、简陋炊具、即煮即食的简单方式,都是布景和道具。买煮花生的人们都有一点消费乡情的色彩,人们浑然忘了:这花生的来源,最大的可能不是小贩自家地里种的,而是来自这个城市的某一个批发市场。在价格悬殊的情况下,小贩会买贵的花生还是便宜的花生?买今年的新花生还是去年或前年的陈花生,或者发了霉的花生?新旧花生各买一半掺起来,一起煮,就算心地善良的主儿了。因此,

我们吃到了不新鲜的花生,正常。

我问过小贩:你这个锅有点小,煮不了多少东西呀。小贩说够用咧。我们发现,煮好的花生卖完后,他马上填入新的,搅一搅,如果有人来买,他捞出来就卖掉了,不管熟不熟。既然不管熟不熟,锅也是做秀,大小无所谓了。生意清淡时,小贩说出了他不想用大锅的另外三个原因:一是大锅沉,推着累;二是大锅费火;三是包括锅在内的设备要尽量简化,如果城管来了,跑起来方便,万一被城管抄走了,损失也不会太大。

我追问他:你是北方人,煮花生为什么不放花椒八角?小贩摆摆手说:放花椒八角会好吃些,但花生会发黑,客人以为花生不新鲜,所以还是不放好。我无语。

熟悉后,小贩称我为老乡。有几天,我们没有叫他的花生,他拦住我,送我一小包煮花生。他说:这是他专门挑拣出来的花生,都是新鲜的,火候刚好,一定好吃。后来他吹嘘:他“认识”花生,很多客人先尝再买,他随手抓几粒花生给客人尝尝,作为诱饵的这几粒花生肯定是新鲜的,他练就了这个本事。我劝他,你不能尽可能地煮好吃一点吗?不就有更多回头客了吗?小贩点点头,又摇头叹息:煮好了,也没啥用。几天后,城管组织行动,横扫街边小贩。小贩人间蒸发,后遂不复至,可能另开辟根据地了吧。看来,煮好了花生,真没啥用!

了解了小小的煮花生,我们心里不舒服。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小贩既没有过人的恶劣,也没有过人的聪明,他

本来是一个朴素的农民,来到城市之后,在逼仄的生活空间中,学会了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懂得了商业包装、广告营销、降低成本、促进销售、提高利润、防范风险等等商业手段,如马克思所说,他努力把煮花生的“剩余价值最大化”。自从煮花生的价值被小贩“最大化”之后,就再也不好吃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煮花生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煮好花生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和一位乡间老嫗随手一施,即得美味,二者之间有体制上的差别。我们对小贩保持关注,常作调侃,愈深入 research,愈觉独出心裁,别有洞天,假若如此下去,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亦非不可能。后来,小贩不幸被城管驱逐,诺奖的事也就 OVER 了。(作者系深圳企业管理人士)

两会深化改革将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温天纳

每逢2月底,环球投资市场的目标总会转向中国两会。基金经理与机构投资者谈到的难免都会涉及两会效应、两会行情、两会概念等等。

投资市场的焦点在于改革主题,三中全会后,改革的蓝图初步呈现。两会前,大家将进一步关注改革政策的方向、方式和框架之落实。国家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目前的重点在于如何解决最为迫切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纸上谈兵的阶段,一切将从规划设计推展至落地执行的阶段。

至于2014年的经济目标,笔者预期与去年持平,经济增长为7.5%,而

通胀率则为3.5%。笔者认为,中央去年定下的经济政策方向不会改变,但是近期经济下跌将影响政策的微调。在中期偏紧的环境下,短期有可能局部微调,以稳定短期稳增长的策略。

在政策的先后次序上,笔者认为落实的先后次序将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企改革,能源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以及金融改革中的行业门槛改革。至于其他较深层次的改革,如土地改革,金融改革中的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改革,因涉及整体风险较大,需要考虑环球与内地形势变化,只能慢慢步向前。

在结构性改革和转型的洪流下,中央对整体经济或个别行业增长下滑

的容忍度将增加,因此市场不可以一厢情愿地以为政府将随时会出手“救”经济。不过,笔者认为上调城镇新增就业目标,显示出中央政府重视就业及民生,估计将持续加推积极的就业政策,以达成就业目标。

在中央的积极财政政政策下,笔者估计财政赤字将略为增加,同时全力优化支出结构,完善税制,以及化解地方债务危机。至于货币政策,笔者预计中国政府将继续坚持以“总量稳定,结构优化”为目标。

地方债务问题是两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如何防止及控制债务风险将成为重点。此外,内地目前产能过剩压力甚大,如何化解也将成为今年的重点。产

业转型升级是其中一个方向,服务业的发展值得大家的关注。内地人口老化,笔者认为养老和健康管理等相关产业具备发展的潜质。在内部需求上,如何加速自贸区的开放也极其关键。

不过,中国的内需很难在短期内大幅提升,主要在于占人口过半的农村人口消费力不足,此外,内地工资水平与社会消费增长水平相当,无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就算社会有多余的购买力,市场看似更倾向于投资房地产或进行私募投资,而非直接消费。

以前,政策主导的增长导致若干产业泡沫化的演变,行政干预也带来众多副作用。三中全会提到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上的作用改为“决定性”,就是为中国长远经济发展拨乱反正,缔造可持续发展的背景。国企甚至是垄断性行业引入民资,盘活经济将成主导方向之一。

金融行业、资源行业、电信行业、铁路行业等等,也将持续慢慢地开放,估计在两会前后将有更多的消息出台,笔者并非一面倒乐观,当中对现有垄断行业实际上更是危多于机。不过,若开放产业能释放需求,体现新的市场价值,行业整体最终也将受益,而新兴产业以及企业若能突围而出,当中不乏新的增长亮点,也是今年两会的重点之一。

(作者系香港投资银行家)

《纸牌屋》中的女性穿衣哲学

周凯莉

关于穿着中蕴涵的哲理,迟早应该有由一位女性来写一本相关的专业书籍,只要是女性,无论她多么年轻,对于在这个世界上如何通过穿衣打扮体现自己的存在感,都会有各自的奥秘了然于胸。一位生存在困境中的女性,无论是物质或是精神上的困境,首先体现在她身上的显性因素,即旁观者所能察觉到的着装上的变化。

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穿着总应该与他们的年龄、处境、性格、乃至阶层的设定相关。譬如热播美剧《纸牌屋》中,女主角身为副总统的夫人,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NGO运作人,性格强势、做事直接、利落。她总是穿着裸色、烟灰色或者黑色系的 one-piece 连衣裙,设计非常

简单,剪裁上基本以直线型为主,棉类等天然的服装材质是其所青睐的。女主角的装饰性配饰很少,最多辅以一条极简的勾勒出腰线的皮带,或者一只设计简洁的手表基本款强调其独立而坚韧的性格。

相形之下,《纸牌屋》中,另一位女性角色总统夫人的社会地位更高,性格则偏向脆弱,因此人物设定之中,她常常穿着紫色的连衣裙或者绣花的荷叶边 one-piece,以凸显贵气却不失女性妩媚的形象。而作为多数党的女领袖,另一位女党鞭强悍、坚韧,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她的发型随意,喜欢佩戴极小的钻石或者珍珠耳钉,常常以白色的丝质衬衫搭配紧身的铅笔裙出镜。特别是令观众印象深刻的丝质白衬衫出镜率颇高,通过这一物事,女党鞭极高的职场地位,以及缺乏爱情滋润

的女性困境呼之欲出。

尽管岁月流逝使《纸牌屋》中这些女性的面部呈现出胶原蛋白缺失造成的不同程度的塌陷,但从穿衣哲学上释放出来的强烈信号,让这些女性角色第一次出场便攫取了挑剔观众的目光。或许《纸牌屋》的服装设计师对于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的著作《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有所研究。书中如此描述上层妇女的着装,“穿得相对低调,相对简单,没有过度的搭配,也没有看得出的多余装饰,她的头发看上去随意,没有发型,但绝对不会油腻”。相反,标准的底层人士着装则是“戴太多的首饰,化太浓的妆,梳太复杂的发型,穿着过度讲究的衣服,闪光的连裤袜以及质量低劣的高跟鞋”。

源于美国文化的务实、接地气,伍迪·艾伦的新片《蓝色茉莉》也秉承了

美式影视作品一贯的穿衣哲学。电影中,作为一位从纽约上东区沦落的落魄名媛,女主角在两个小时的电影中,频繁更换着寥寥无几的名牌裙子出镜,以及永远拎着同一只爱马仕手袋,导演通过其服饰的匮乏,生动勾勒出名媛“落地凤凰不如鸡”的尴尬处境。相形之下,擅长制造梦幻泡影的韩剧就显得不那么严谨,它们和中国近期兴起的青春偶像剧一样,为了塑造看上去美好的镜头,以及刻画人物的完美形象,即使主角设定为一个贫困的城市蓝领,也必然穿着光鲜,租住着几百平的豪宅,并且忙于海誓山盟的刻骨恋情,毫不囿于高昂的都市生活花费与尴尬的银行卡余额。

说到底,久受儒家影响的东方文化更倾向于树立一个值得尊敬以及模仿的高高在上的权威存在,大众需要

消费影视作品中的美好形象,将其投射在自己身上,满足其在庸常生活中对于不凡生活的一切想象,从而成功汲取心理上所渴求的营养。也正因为如此,每一部热播剧的盛行,比如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城市猎人》,乃至中国自产的《我们结婚吧》、《辣妈正传》……总能在淘宝上刮起一轮跟主角学穿衣的凌厉“爆款风”。

可是,穿上它,你便是她?不,答案当然是残酷的。说到底,人们渴求的并非只是美艳的华服,而是那些华服所代表的优裕生活与高尚的阶层地位,但人们往往忘记了,虚幻的物质需要够分量的灵魂和的不朽的斗志去支撑,譬如拥有平和与自信这两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品质,这才会真正让人倾慕不已。

(作者为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